



九江中学堂开学记

■ 冯晓晖

1901年1月,在八国联军炮火下仓皇逃至西安的慈禧太后,为挽救岌岌可危的清王朝,以光绪皇帝的名义下诏变法,开启了晚清最后十年的“新政”。其中教育制度的革新堪称一场彻底革命:废除了延续千年的科举制度,使现代教育体系和教育思想得以全面引入中国。教育改革同样推动了九江地方教育的近代化进程。在教会学校长期占优的背景下,本地官府与士绅开始兴办新式学堂,赣北第一所公办新式中学——九江中学堂由此而生。

清末新政中的学制重构

中国传统教育在全国范围内并没有一个完善且系统的学制。从乡学、县学到书院,都是一级制教育,其主要目的是应付科举考试。书院虽为地方最高等级的教育机构,但实际上更类似于现代的中学。清末时,九江府有濂溪书院(位于今九江市外国语学校附近),南康府有白鹿洞书院。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随着各租界教会学校的兴办,西式教育体系逐渐传入中国。1898年戊戌变法中,曾提出学习西方建立从小学到大学的学制体系。但这一改革仅停留在建议阶段,就随着短命的百日维新而夭折。

1901年1月,慈禧太后下诏推动变法;同年7月,两江总督刘坤一与湖广总督张之洞联衔发出了著名的《江楚奏秦三疏》。其中第一疏专门论及教育制度改革,提出多段制学体系:州、县设小学及高等小学;童子八岁以上可蒙学,十二岁以上上小学,十五岁以上入高等小学;府城设中学,十八岁以上、在高等小学毕业生方可入学;中学三年毕业后,可升入省城高等学校,再毕业生入京师大。该疏还强调书院应改为学堂,“今日书院积习过深……必须正其名曰学,乃可鼓舞人心,涤除习气”。

清廷采纳了上述建议。1901年9月,下令将全国书院分别改为大小各级学堂。1902年颁布《钦定学堂章程》,次年进一步颁布《奏定学堂章程》(通称“癸卯学制”)。这是中国第一个由中央政府发布、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的近代法定学制,标志着新式教育制度的正式确立。

江西新学的奠基与推进

在朝廷的明令和全国教育改革的浪潮中,江西省的新学体系也随之建立,甚至在全国范围内表现出某种领先之势。时任江西学政吴士鉴(1868年~1934年,号桐斋)与江西巡抚李兴锐(1827年~1904年,字勉林)均对学制改革持积极态度。李兴锐出身湘军,曾任上海机器制造局总办,是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1900年11月他升任江西巡抚后,随即向清廷提出“改科举、设学堂,亦求贤之要务”。

《申报》1901年4月12日头版刊登的《报纪衡才知变系之以论》记载:“悉江西学政吴桐斋宗师岁试瑞州府属时,传见各学教官,逾以八股弗入时务,以正文体;时务亟应讲究,以成通材。并拟咨请江西巡抚李勉林中丞创设中西学堂,俾得造就人才,挽回危局。”

1902年,随着《钦定学堂章程》的颁布,按照新学制体系,由府属书院改设的中学堂开始在江西陆续建立,标志着新旧教育体制的真正交替。洪都中学堂(今南昌

三中)由洪都书院改办;九江中学堂(今九江一中和九江职业大学前身)由濂溪书院改办;赣州中学堂(今赣州一中)由阳明书院改办;袁州中学堂(今宜春中学)由昌黎书院改办;南康中学堂(今星子中学)设于南康府二贤祠。此外,其他府属书院也陆续改建。

短短两年间,江西十三府及直隶州先后创设中学堂共十四所,并普遍开设英文、算学、史地等新式课程。自1905年起,又有十余所中等学堂陆续落成。江西新学体系的建立,可谓在当时“领一时风气之先”。

九江中学堂的筹划

据《江西省教育志》《江西通史·晚清卷》等史志记载,九江新学堂的建立,不仅在江西,在全国范围内都属较早。《申报》1901年10月29日《浔郡官场纪事》载:“广饶九南道兼九江关监督明华亭观察,于本月初十日拜会前山西学政刘幼云大史,筹商宗旨设立学堂事务。”当时的广饶九南道是江西四道之一,下辖今上饶、九江地区,驻九江府,并兼管九江关事务。

1902年3月,《申报》报道,江西广饶九南道道台瑞澂正筹划办学经费,准备立即开设中学堂。不久,瑞澂又捐出养廉银,在城乡各处设立十所蒙学堂(小学),礼聘教师教育贫寒子弟,并提供笔墨书籍等物品。同时,还派出四位督学,各学堂均已正式开馆授课。

可能正是由于这些记载,使得本省部分史志认为九江中学堂开设于1902年。九江一中、九江职业大学(继承于九江师范)遂以此为校史开端,自称创办于1902年,为赣北地区第一所现代公立中学。然而,1902年的“开设”实际上只是筹办,距离正式开学还早着呢。

仔细想来也是如此,旧学(书院)改为新学(学堂),绝不可能是沿用原址,改个牌子就能运转。课程体系已变,新增了不少从未教授过的课程,那么学生如何招收?教材是否齐备?教师又从何处聘请?最关键的是,办学经费是否落实?更现实的是,那时科举考试仍在继续。

因此,创办新学不仅困难重重,也在各个方面面临阻力——延续千年的传统教育体系,岂是轻易能改动的?况且,以清末腐败的行政生态来看,各级官员会不会借此机会中饱私囊,这几乎是可预见的事。

拖延中的开学之路

广饶九南道道台在1902年3月宣称开学,然而学堂还没有影子,各种苛捐杂税却先一步来了。5月,九江官府称因遵旨开办中学堂,但经费无着,只得设立“肉捐”,每宰一头猪抽取二百文,以补贴办学。除“肉捐”外,其后又加征“米捐”“鱼捐”“船捐”等等。当然,没人解释,之前的濂溪书院是怎样维持办学的?费用从何而来?为何同样是公办学校,改为新学后就必须要向百姓征税?

广饶九南道以开办新学为名,借机假公济私,苛派勒捐,弄得民间怨声载道。1903年8月,由于教育税太重(每斤鱼加征二文),再加上江水暴涨影响捕捞,九江百余渔户到道、府衙署焚香叩求,要求豁免加征。有些民营船运公司为了避税,不得不挂靠外国轮船公司名下。更极端的,还出现百姓打砸新学堂的事件;建昌县(今永修县)

上万民众因教育税围攻县署,真可谓斯文扫地。

在这么闹腾腾、乱哄哄一片中,1903年9月,九江府颁布了《浔郡中学堂章程》,请注意,并非是“九江中学堂”。公告称郡城仅有濂溪书院一所,已改为九江中学堂,现在学舍即将落成,中西教习亦均已分别聘定,兹定于九月间开学。彼时九江府辖德化、瑞昌、湖口、彭泽、德安五县,故初创时的办学章程中规定:

- (一)学生名额暂以四十名为额,候经费充足再议推广;
- (二)五县学生名额,拟德化十五名、德安五名、瑞昌六名、湖口七名、彭泽七名。再于正额之外不拘具分,共各取二十名。如各县所送学生不敷正额,另由该县补足;如候至两三月不送,准以备考暂行递补;
- (三)各取学生正额缺出,按县分别递补。其未补之前,如有向学志切者,准其随班听讲,惟不借宿舍,不供伙食;
- (四)所取学生须在年十五岁以上、二十五岁以下,身家清白,文理通顺,志趣纯正,体质强实,无嗜好者,方为合格。先期由父兄家属邀同族邻出具保结,赴县报名投考,该县即照所定名额加一二倍录取,给文送府听候甄别。

那么,浔郡中学堂在9月如期开学了吗?依旧没有。直到10月25日,德化县才组织选拔考试。11月5日,九江知府孙景裴召集五县各取生集中考试,总算完成四十人的招生任务,并宣布11月20日开学。九江中学堂由知府亲任监督(相当于现在的校长),孝廉张益葆任副监督,孝廉吕瓚、周观涛任经史教习,贡生赵辉、万和任英文及算学教习。

这所仅有四名教师,招收四十名学生的赣北第一所公立新学,从“宣称开学”到真正开学,整整经历了一年零八个月。因此,九江中学堂的开办经过大致可作如下概括:1901年开始筹划,1902年进入筹办阶段,1903年11月20日正式开学。由此看来,九江一中与九江职业大学现行校史中的相关记载并不准确;或可称肇始于1901年,或可称开办于1903年,而“创办于1902年”的说法与史实不符。

九江中学堂初期,科举考试仍在继续,新学与旧学两个体系并行共存,士子们真正看重的依旧是科举。直到1905年科举正式废除,旧学体系才算彻底结束,九江中学堂也随之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从九江中学堂的创办过程,不难看出清末“假维新”的真实面貌:上有朝廷革新之令,下却是旧官僚沿袭旧习,甚至借“办学”为名层层摊派,使教育成为百姓难以承受的负担。新学堂从筹划到真正开学历经一年多的拖延,其间的敷衍、腐败、推诿,几乎就是清末末路景象的缩影。这样的政治生态,自然难以支撑任何真正的制度革新,王朝的覆灭也在情理之中。

然而,在这场名为“新政”的变法中,教育改革却是少数能够真正落地、并留下深远影响的部分。科举的废除、多段制学体系体系的建立,使现代教育理念第一次系统性进入中国,也为地方教育的现代化打开了空间。九江中学堂虽在夹缝中诞生,步履维艰,但它毕竟成为赣北最早的新式中学,可以说,近代九江公办(国立)教育的起点,正是在这场曲折而又必然的时代变动中悄然奠定的。



沧桑百载王家井

■ 王国宝

“九井十八巷,巷巷通街上”,这是修水宁州古城老街坊的一句口头禅。明嘉靖版《宁州志》、清同治版《义宁州志》记录的宁州古城内的老九井分别是:祝家井、周家井、铁炉井、孝友井、义井、徐家井、午水井、双井、龙王井。

州志上记录的九井,除老县政府门口被围栏围住的周家井外,至今仍然在使用的就仅留下北门的双井。其他的七井都逐渐湮灭在岁月的长河中,难觅踪影了。20世纪70年代之前,宁州老城近两万居民的生活用水基本靠城内九井之外的另外几口古井,而位于修江路(即义井巷、冷家巷)中段的王家井就是使用率最高的。

说到王家井,那就大有来头了,因何而得名?当然就是王家井附近的几处王家祠堂。义宁王氏始祖王琮早在唐宪宗年间从浙江金华迁居分宁城外东岸崖阳山下泥湖,是修水历史上迁居较早的九大姓氏之一。迁宁后高隐不仕,盛德裕后,科名鼎盛,子孙遍布八乡。《义宁州志》有详细记录的进士达18名,名臣、宦官、义举、善士多人。至清朝时,宁州各姓纷纷在州治兴建祠堂,而王氏有七座之多。

如此密集的王氏宗祠,是因为王氏是迁宁较早的十三姓氏之一,人口众多。二是州城西高乡三十六都的官桥,是王氏隆兴之地,仅宋代就创造了五代十登科的辉煌。三是州治西有较多王家产业,比如清奉政大夫王梅溪在肖家菜园创建的梅溪书院,王氏宗祠就是购买铁炉巷王鲁玉公馆而建。王鲁玉其子王瀛,历任宣化知县、蕲州、易州、通州、荆州知州。四是州治西还有为纪念明朝东平州儒学训导、举人王英而建的攀桂坊。

离王家井最近的固公祠又称敦五堂,坐西向东,东抵义井巷(现修江路),后邻查祠,南临冷家巷,西面就近聚祠、彭祠、李祠、廖祠。敦五堂即王固公祠,原本纪念王琮六代孙,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进士、奉政大夫、光禄少卿王仕甫。王仕甫与长子王固、孙王纯中、曾孙王本、玄孙王鈇父子五代皆为北宋股肱之臣。王固长子王纯中是皇祐五年进士,黄庭坚曾为其撰《王纯中墓志铭》。曾孙王本元丰八年进士,豫章志载《德才兼备之王本》,周季凤在《宁对》中有记录。玄孙王鈇,南宋诗人,以父荫与徐俯之弟徐琛同表被荐,任户部侍郎、赠正奉大夫、广东经略使。王氏后裔遍及赣、湘、鄂三省周边县市,清嘉庆四年(1799年),固、定两支集资购地兴建了以“敦亲睦族、孝友传家”的“敦五堂”和王宗圃试馆。

随着岁月的推移,相距百米的义井已不能满足居民需要,为解决饮用水的不足,王家在敦五堂与王宗圃试馆旁边挖了一口水井,井壁用青条麻石垒砌而成,方形井口正中处搁置长条麻石是为了方便大家取水。因此井口呈现“日”字形,寓意水井有条的日常生活秩序和“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儒学理念。

20世纪30年代,王家又在日字老井旁增修了一口水井。王松古,又名王馨庭,担任过江西省政府议、和数县税局局长等职,他创办了漫江洞下春茂昌、齐茂昌茶行。任修水县经征局局长期间,寓居敦五堂。与时任修水县长的王震牵头筹资,在敦五堂旁再凿一口水井,与前井相邻,直径1.5米,水深约8米,井沿为“中”字造型。寓意水利万物而不争,中正仁和之意,并与南面水井予以区别(中字井为北井)、北井洗衣浆裳,南井(日字井)也修缮一新,一直沿用至今,成为宁州城内最大的水井。

新中国成立后,敦五堂王氏宗祠被征收成民房,20世纪80年代初被房产公司改建成公房,仅留下王家井西侧的王宗圃试馆和固公铺屋,因王家井的家喻户晓而渐渐遗忘了敦五堂的名字,以至于当时人住的周边居民,都只会说:我家住在王家井啊,却忘记了是哪家祠堂。

20世纪70年代,男孩子到了初中毕业,就要包灶。包灶有两项任务:一是砍柴,每到星期天,结伴上山砍柴。另一项是担水,一到放学,男孩子放下书包就挑起桶去排队挑水。

从黄土岭到衙前,上半年人们多到王家井去担水,因为王家井水质甘甜、清澈干净。下半年靠近河边的居民,多去河边的沙井里挑水。从鲁家坳到马家洲、南门头、东门、北门沿河都有沙井,沙井的水很清,但是有一个缺点,出水供应不上就得排队哦。

20世纪70年代末,修水电厂增加了一个水务车间,开始的时候是在电厂附近(后来的山谷饭店)打了一口大的井,因为供水不足,后来又在北门靠河的酒厂附近又打一口水井,才能保障供水车间的供应。水务车间建成后,供应南到二小、西到老县政府一带的单位使用,为方便老百姓,在沿途设了几个供水点,很简陋的一个木亭子,伸出一根自来水管,一分钱一担,每一个供水点都有一名阿姨守着卖水。即使一分钱一担,有劳动力的还是为省这一分钱去王家井、周家井,刘爷井挑不要钱的水。

每逢过年过节,王家井周边成为了最热闹的地方。洗衣洗菜、排队挑水过年的很繁忙。多年来形成一种风俗,年末最后一天水缸要挑满,大年初一这天是不去挑水的。那时过年桌上都有一道炒明笋的好菜。王家井边上一直到冷家巷口、鸚鵡街口、幸家祠堂、卢家巷门口一带,摆了几张水井的桌子,桌子旁边放满了排队的竹篮、笋桶,因为靠近水井,方便切笋用水。切笋的大伯大妈大多是县医药公司的退休职工或家属。切笋可是个技术活,再吝啬的家庭主妇都不会去省这一、两角钱,因为医药公司的大爷大妈切药练得刀工好,切得均匀,又不浪费。

王家井的水井一直保护得好,每年年终总会有德高望重的大叔大妈到每家每户募集,只要是在此用水的街坊,都会你家二角,我家三角,众筹几十元钱洗一次井,把挑水时不慎掉入的杂物清理出来,洗井的时候,旁边站满了人,主要是寻回打水时掉入井里的铁皮桶。

王家井和老城居民可是息息相关,从新生婴儿洗三朝到王家井祈水。赤日炎炎时,在没有冰箱的年代,买不起冰棒又嘴馋的小孩子,会用井水冲一杯红糖水,勤快的也会去郊外山上摘些凉粉果去用井水做凉粉,西摆从犀津古渡到严家洞,观音岩挂壁上可是长了不少的凉粉果。还有一点特别又神圣,如有老人过世,孝子家人一定要到王家井敬请泉神,烧纸敬香,清水给老人洗去最后的尘埃,体面地离去。每到春节、元宵等节日,戏灯笼是老城最受大家欢迎的活动之一,而发烛仪式大多在王家井举行,一是地面比较宽阔,同时又地处中心位置。

沧桑两百春,汨汨不言辛,岁岁藏紫气,朝朝涂穆尘。2018年,县政府在旧城改造项目中将这两口古井修复一新,仍然保留其历史风貌,拆除了外围杂乱附添建筑,义井巷的王家井不仅是修水人民睦亲敦友优良传统的体现,更是老街坊、老修水人永远的乡愁。尽管宁州古城在发展变迁,经历了二百多年风雨洗礼的王家井,依然在默默地奉献着它的清冽甘甜,而且成为古城重要的历史遗存,吸引着众多游客前来参观。



画中的庐山别墅(二)

■ 孙海帆

九江美术家分“山上”和“山下”的,“山上”的指出生、生活和工作都在庐山上的画家,“山下”一般来说都生活在九江城区内。庐山上的画家如杨豹、李杏、夏梅生、袁卢明、沈志斌等,他们搜集奇峰打草稿,足迹遍及庐山的角角落落,作品包罗庐山春夏秋冬,他们是当之无愧的“庐山画家”。而就庐山来说,“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庐山画家们是让“山下”的画家艳羡的。事实上,对出生于20世纪40~70年代的九江画家来说,当年去庐山画画是一件苦中作乐而又奢侈的事情。大家都向往去光影多变、移步换景的山上写生,但是真的要上山,除了带画具、干粮和衣物,还要解决住宿问题,甚至还要防范野兽出没等诸多问题。

1976年,已故画家吴方贵在秋冬之交上庐山写生一周,带回一摞水粉作品。他说这时节庐山最美,绘画时“穿着雨衣,因为雾大,洗笔的水都冻成冰了,非常冷。”可惜如今他这些挨饿受冻得来的作品大都难以寻觅,好在他的学生王珍平保留了其中的一幅《庐山乌龙潭》。

1886年,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的22岁传教士李德立为在华洋人寻找避暑地初登庐山。李德立在一位中国传教士戴古臣的陪同下,从好汉坡开始登山,由此拉开了庐山开发的序幕。90年后的1976年,戴古臣的曾外孙背着画箱艰难地攀登在这条1000多级石阶的陡坡上,他就是包泽伟。

对于庐山写生的经历,包泽伟回忆说:“到庐山写生是幸福之旅,也是艺术之旅。我上山写生多次,印象中与画友李见深一起爬好汉坡背着画箱翻山越岭写生就有三次。1982年夏季季师同学分配到庐山中学任美术教师,我借宿住了一周,画了10本钢笔水彩画,这也是我至今依旧是对庐山风景念念不忘,依依不舍的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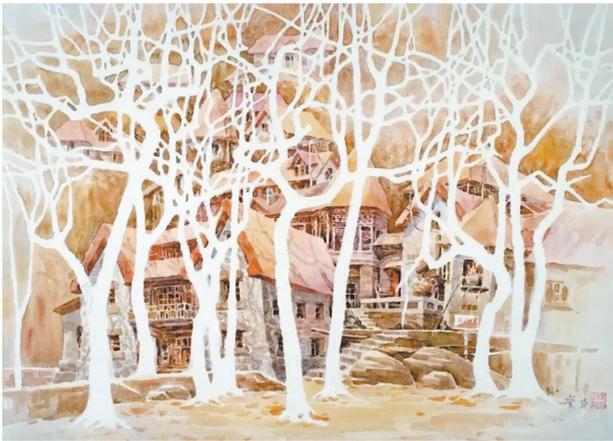
对童年的包泽伟来说,在东西方文化都很浓郁的家庭氛围中成长,应该是上天特别的垂爱。受外祖父富藏书的影响,包泽伟的父母都沉醉于艺术。他的父亲绘画天赋很高,擅长风景画,包泽伟从小就是拿画笔当玩具长大的。有一篇题为《浓墨重彩画心境 感悟年华绘沧桑》的文章中曾这样介绍包泽伟:“他的外祖父(戴古臣之子)戴进修,曾在新加坡柔佛开橡胶园,抗战爆发后回国)是新加坡华侨,毕业于圣约翰大学。他家的祖屋原有花园,还有玻璃花房。房屋的主体是一座意大利风格的三层洋楼,每间房子里面都有巴罗克式壁炉、地毯、沙发、古董。包家藏有许多中外书画,包括《世界美术全集》、《苏加诺藏画集》、《苏联画报》、《星火杂志》等等,这样的家庭在四十多年前是十分罕见的。”

遗憾的是,包泽伟于20世纪80年代南下

《珠海特区报》任主编,后又任古元美术馆首任馆长。他青年时期所有的画作连同庐山写生的10本钢笔水彩都留在了老屋,在老屋拆迁时他未及赶回,他的那些作品今日难得一见。九江地方虽不大,但彼时学画者众,在浔阳江畔、甘棠湖边、西园小巷、龙开铁桥时常常能看到聚精会神的青少年在写生,这些画们也是“低头不见抬头见”。1979年,包泽伟和郭兵在庐山隧道对面山上写生,忽见18岁的九江师专美术系学生陈玲荣等也在此,见到自己崇拜的“老大哥”包泽伟,陈玲荣等拿出相机和包泽伟留念。时隔多年后见到这张照片,包泽伟在感慨之余,连夜赶画了一幅《如琴湖的回忆》,算是对遗失的一种弥补。

陈玲荣是跟着学校的饶国安、谭铨智老师和全班同学一起上山写生的,陈玲荣说:“号称万国建筑博览会的庐山别墅,造型百态千姿,春有嫩绿掩映,秋有金黄渲染,红顶石墙,花窗门楣比较适合西画的表达,也很入画。”所以直到今天,赴庐山写生还是九江及江西各美术学院学生的必修课。回忆起那次教学写生,陈玲荣说:“为了省钱,大家先坐车到莲花洞再从好汉坡走上去。自己带着铺盖,十几个人一间住在‘庐山一小’的教室里。大家都很珍惜这次机会,一大早就出去画,想多画几张。闲暇时,同学们在黑板上用漫画你画我画你,捣鼓出来十几个漫画脸,惟妙惟肖。毕业那年,大家相互在留言本上都用在庐山画的漫画做纪念。”最后他说:“后来上庐山画写生就多了,几乎每年都去,山光云气,春夏秋冬,别墅始终是画的主角,除了人文恐怕更多的还是和西画的审美契合吧。”

(未完待续)



李杏 水彩《庐山别墅》(1994年)



饶国安 水粉《日照峰别墅》(1980年)



陈玲荣 油画《秋山醉》(2018年)



孙九斌 水彩《庐山雪景》(2017年)